

后帝国时代的欧洲与跨境共同体

Post-imperial Europe and Transborder Communities

弗拉基米尔·比蒂 (Vladimir Biti) / 李银波 (Li Yinbo) 译

内容摘要：中东欧的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崩溃后，后帝国时代的中东欧普遍弥漫着一种沮丧情绪。在这些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家之间相互仇视，国内也因民族仇恨而陷入分裂，领土被迫割让，数千万人因此丧生，引发大规模的难民潮。另一方面，这些新生民族国家也处于经济和社会上的悲惨境地，现代化道路上的诸多障碍如基础设施落后、失业、通货膨胀、社会分层僵化、政府腐败无能等又引起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出人意料的是这些人口迁徙巨大地增强了中东欧人民的流动性和想象力。在后帝国时代中东欧完全重塑的政治版图上，连那些最卑贱最绝望的生活也受到其愿景的影响。其结果就是出现了由处于“身份不确定区域”的后帝国时代受害者们组成的跨境联盟。这些受害者们在其愿景的驱动下相互联络，给所属的民族国家带来了社会和政治上的动荡甚至分裂。

关键词：后帝国时代的欧洲；跨境共同体；身份不确定区域；破坏性的模仿

作者简介：弗拉基米尔·比蒂，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文学与文化系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译者简介：李银波，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传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跨文化传播研究。

Title: Post-imperial Europe and Transborder Communities

Abstract: In the post-imperial East Central Europe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German, Austro-Hungarian,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disappointment was commonplace. The imperial *successor states* were involved in revengeful animosities with neighbouring states, torn by their majority population's hatred of domestic minorities, bereft of tens of millions of their co-nationals who had remained in now foreign nation-states, exposed to huge influxes of refugees, and embittered by the territorial concessions that they were forced to make. By contrast, the *newly established nation-states* were plagued by miser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poor infrastructures, unemployment, inflation, rigid and immobil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orrupt and inefficient administrations. Such developments gave rise to huge and hitherto unimaginable deportations and migrations of populations,

which, paradoxically, simultaneously immensely increased the mobility of their imagination. In the completely reshaped geopolitical space that now loomed large on the horizon, even the meanest and most hopeless of lives became open to the play of the imagination. This is how the transborder alliances of post-imperial victims who were banished into the “zones of indeterminacy” came into being. Carried by the energy of their *longing*, their interlocking introduced imbalances, fissures, and divisions into the nation-state communities, which determined their *belonging*.

Key words: post-imperial Europe; transborder communities; zones of indeterminacy; subversive mimicry

Author: Vladimir Biti is Professor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Faculty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Vienna, Austria, as well as a member of Academia Europaea (Email: vladimir.biti@univie.ac.at).

Translator: Li Yinbo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t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Arts & Law,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9, China) (Email: yinbo163cn@163.com).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后中东欧四大帝国（即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解体，以及随后在它们版图上新建立起来的帝国主要继承国及众多民族国家，导致中东欧出现了后帝国时代的残乱局面。根据《凡尔赛条约》（1919），西方大国在重塑中东欧地区时引入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赋予中东欧各民族建立其自治国家的政治权力。然而在中东欧建立这些在宗教上、民族上、文化上和语言上混杂的民族国家，并不是西方大国单方面强加的一个决定，它也是中东欧各民族解放运动倡导者所热情追求的目标，这些民族解放运动倡导者认为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是他们建立自己新政权的天赐良机。尽管“民族自决”的原则在中东欧地区的实施是旨在将中东欧国家“西欧化”，但该原则却加剧了中东欧国家中出现的挫折。该原则将中东欧各民族人民系于一个民族独立的模糊愿景之上，然而由于各民族国家糟糕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落后的基础设施、失业、通货膨胀、僵化的社会阶层、政府腐败无能等诸因素，民族独立之愿景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使命。

这些新生的民族国家将其落后混乱状况归咎于前帝国或外国长期施加给它们的剥削和奴役。实际上，这些国家的民族精英们也在致力于医治这种长期遗留的“病态”状况（Brubaker 79）。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那些医治

创伤的政治行动有一个意外的后果，就是其国内从前的权力关系发生了逆转，就象伊凡·贝伦德(Ivan Berend)所说：“以前的统治民族现在变成了少数民族，而新的统治民族则为从前所受苦难寻求报复”(Berend 187)。此外，这些民族国家还普遍弥漫着一种落后感，现代化道路上的无数障碍也激起了民众的痛苦、仇恨和反抗。而且，这些民族国家中的许多少数民族，如乌克兰人、克罗地亚人、斯洛伐克人、尤其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在国内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感到自己是《凡尔赛条约》的受害者(Kożuchowski 8-9)。而另一些少数民族由于被剥夺了自决权，象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或象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他们永远是这些国家分裂甚至毁灭的内部因素。

中东欧各民族为发泄其伴随《凡尔赛条约》而出现的挫败感，还引起这些新建立的民族国家之间相互敌对和仇恨，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之间、意大利与南斯拉夫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最终为这些民族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独裁者上台执政铺平了道路[如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国王(King Alexander)、波兰的毕苏茨基(Piłsudski)、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Antonescu)]。进入20世纪以来，尽管西欧的意识形态存在以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一方，而以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及反闪米特主义意识形态为另一方的明确区分，但在东中欧这一区分的界线却越来越模糊，而这里的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力却持续增长。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东欧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建立起通讯网、交通网、公共机构网，西欧现代民主社会的人口流动性也出现在中东欧地区。然而中东欧的那些民粹主义领袖们通过充分参与各种意识形态间的杂交与融合，滥用了这种现代民主社会的人口流动性，将其利弊颠倒过来了。

现代性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人所设想的社会却是另一个人的政治监狱”(Appadurai 32)。当中东欧的那些帝国解体后出现人口流动时，这种人口流动性失去了其在西欧国家呈现出的解放作用，相反却呈现出胁迫性质，因而引起难以想象的大规模移民。“到1890年，有近40%的奥匈帝国居民离开了其家乡或原来的居住地而移居到帝国其它的地方居住”(Judson 334)。奥匈帝国大约有400万人移民海外，其中有数十万人在几年后返回帝国。这些大规模迁徙的一个后果就是帝国的一些大城市象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萨格勒布等的人口激增(Judson 335)。帝国其它的大都市或中心城市也情况类似。可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覆没使得占维也纳人口25%的居民成为住在新生奥地利国家的外国人，因为这些人出生于新生奥地利国家之外，除非他们选择当地国籍”(Hobsbawm 15)。当苏联瓦解时，从16世纪中到20世纪中因殖民而居住在苏联境内俄罗斯共和国以外各地的俄罗斯人约有2500万人，他们现在突然变成俄罗斯联邦的国外侨民(Brubaker 6-7)。此外，有300万匈牙利人居住在罗马利亚、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乌克兰，有200万

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在塞尔维亚、蒙特内哥罗、马其顿，有 200 万塞尔维亚人居住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有 100 万土耳其人居住在保加利亚（Brubaker 56）。不言而喻，后帝国时代欧洲政治地理的破坏性重构深刻地惊动和搅乱了原帝国大多数居民的生活，并使他们普遍产生一种无保护感。民粹主义者则利用这种社会动荡来达到其实用目的。因此就大多数欧洲居民而言，人口流动作为西欧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它一方面成为西欧的福音，另一方面却成为中东欧的恶梦。

然而，后帝国时代的欧洲出现的巨大重构在严重威胁其居民的物质生活时，却极大地增加了其居民的愿景的变动性（Appadurai 6）。在中东欧完全重构的政治版图上，就象阿尔琼·阿帕杜拉（Arjun Appadurai）所说，“即使那些最卑贱、最绝望的生活，那些最野蛮最不人道的环境，最严峻的不平等”也变成“人们可以想象的事情”（Appadurai 54）。这就是说，无论迁徙是多么艰辛，它仍带有一定程度的解放效果。以前的那些帝国已经构筑了它们的通讯网、交通网和商业网，以增强它们对边境族群的军事控制和经济剥削，防止他们投奔其它的帝国。这些帝国的交通网一方面促进从周边省份运进粮食和原材料（Barkey 106），另一方面也向相反的方向输出制成品。尽管现代化声称可令所有参与方实现平等，它却使帝国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Berend 20-22）。就象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于一个世纪前实行的语言标准化政策一样，下面这句话强调了帝国对周边省份的整合措施：“只有服从该政策者才能被视作是进步的或现代化的人”。而那些继续忠于其古怪传统习俗的人则将自己局限于自我封闭的本土之上，将自己排除在普世文明的进程之外，这类人被蔑称为落后者。其结果是现代化将帝国边缘省份也置于加速适应的压力之下，尽管那里装备落后，也不得不妥协。

但是，面临这种“同等歧视”的压力，那些边缘省份的居民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存技能。帝国现代化所提供的共同背景使那些边缘省份也认识到彼此间的差异并寻求趋同化（Evans; Cornwall 174-175）。通过现代化所引起的破坏性迁徙，这些边缘省份的居民获得了解许多其它省份的机会，而此前他们对那些省份几乎是闻所未闻的。由于帝国各省份之间存在着政治上、宗教上、文化上和语言上的差异，尽管人们见到别的省份的感受也是不愉快的、沮丧的、甚至是恐怖的，但这种感受使得各省份的族群与同样遭受帝国中心居民歧视的族群之间结成联盟以加强他们反抗中心歧视的力量。各省份为反抗共同的压迫者而结成牺牲共同体，他们这时忽略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

二

的确，被剥夺者为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力量而与遥远地方同样处于困境的他者进行联络，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东欧，人们又

对以前的做法刚刚做了改编和校正。就近代欧洲来说，法国的新教派学者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于17世纪末发起了一个由因持“错误”宗教信仰而被迫离开自己国家者组成的国际学者组织“文字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在18世纪中期，法国著名作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再次投身于这种选择性参加的同类人组织，但他的目的是联合政治上的弱者和被剥夺者。尽管他属于法国的文学和文化界，但他是一个新教徒、持异见者、贫穷的小资产阶级，总之一句话：他是一个居住在法国的外国人，是贵族社会中的一个陌生人。这些都是描绘他个人卑贱身份的词语。由于卢梭那带标志性的二等公民身份令他深感沮丧，他被迫在法国内外的新教徒中寻求有影响力的同盟者。为在法国内部寻求支持，他曾求助于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对新教徒个人主义倾向的赞扬，以反对天主教徒的相互依赖倾向（*The Spirit of the Laws*, XXIV.5 and XXV.2）。为在国外寻求支持，他将伟大的英国作品介绍到法语世界。

卢梭作为一个法兰西民族的二等公民，住在一个南部的城市共和国日内瓦，于是建立起一个“跨境联盟”（*transborder alliances*），以支持国外其它民族抵抗由他的特权同胞施加的文化压制政策。同时，他当然也想取得国外其它民族的支持来进行他在国内的抵抗行动。然而，卢梭的复杂联络行动带有在整个现代欧洲受压迫的个人和群体所具有的特征，这不仅源于其宗教信仰方面的因素，那仅次于他新教信仰的日内瓦共和国也因处于边缘位置和次等角色而与巴黎迥异。卢梭在其《论不平等》（*Discourse on Inequality*）¹中解释说，这样一种处于边缘而又受压迫的共同体促进了共同体中各成员之间的彼此归属感。在他看来，小民族或小国家更有利于未来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和实施，从而取代腐朽落后的君主政体。

因此，当卢梭在一封“反对强大而狡诈的侵略者”的公开信《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Considerations on the Government of Poland*）中谈论波兰民族时，他采取公开谈论的方式，有意选择与伏尔泰（Voltaire）致俄国专制君主凯瑟琳二世（Catherine II）的私人信件方式绝然相反。他选择支持被侵略者而不是侵略者（Wolff 238）。他说：“如果你让一个波兰人永远不能变成俄国人，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俄国就永远不能征服波兰”（Rousseau 170-171）²。无人能摧毁一个如此天然根植于自己品味、风格、偏见甚至罪恶之中的民族，即如此有别于其邻邦的民族（Rousseau 163）。卢梭对波兰的这种独特认识，也与伏尔泰对俄罗斯人、波兰人、鞑靼人和匈牙利人不加区分混为一谈的认识绝然不同。当整个欧洲都在法国的品味影响下而变得千篇一律时，波兰人则必须通过耐心的民族教育来培育自己独特的民族情感并捍卫之（Wolff 240-241）。只有继承并捍卫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之根，才能成为世界民族大家

1 即《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译者注。

2 译文为译者根据作者译文译出。

庭之一员，而避免变成仆从。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卢梭通过提供一种更为公正的共性，以致力于联合那些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受到压迫的受害者们。

卢梭坚决捍卫那些受到启蒙运动、现代化、政府管控和人类理性损害的“天然族群”的思想，深深吸引着德国的浪漫主义者。然而，由于所拥有的参与宏大历史进程的世界性资源并不充分，这些边缘族群遇到了已经启动的全球化进程引起的深层动荡效应。因卢梭在其所在的小城市共和国中亲身体会过这些边缘族群遭受的挫败感，他满怀同情地支持他们借助本土神话来保护自己的族群免遭除根的做法。德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接收了卢梭的基本理论，认为所有民族都必须推翻强加在其头上的代理人以回归到自己民族的天然起源。卢梭有一句话，即“一旦一个民族接受了代理人的统治，它就不再自由，它也不再存在”，这句话在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共鸣，因为他们正在试图推翻法国专横统治，而当时德国贵族就是法国专横统治的代表¹。为此，他们积极参加卢梭倡导的从属民族联盟。

德国反启蒙运动者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在其文章《希伯来诗歌的精神》（*The Spirit of Hebraic Poetry*, 1783）中继承了卢梭的自强式跨境联盟。他在该文中从回顾历史的角度深刻地讨论了当时欧洲的犹太民族问题。他说，“正如德意志是一个由众多国家组成的民族而奥地利则是一个由众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一样，古代的以色列也是一个类似的‘极好例子’，即它早在成为一个国家之前就是一个由12个部落或独立共和国构成的民族”（Barnard 20）。他似乎要给自己的德国同胞一个例证，因此他强调犹太民族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里已形成一种在充满仇犹的恶劣环境中保持自己犹太身份的能力。他们既保持有对共同法典的忠诚，又保持有共同的历史语言、民族传说与记忆，他们供养家庭和维持家庭纽带，热爱并尊敬他们的先辈，这一切都使他们逐渐走向免受中央权力胁迫的某种共产主义秩序。“是法律而不是立法者在统治，一个自由的民族应当自由地接受并尊重它，那隐性的、理性的、仁慈的权力应当指导我们，没有任何锁链来囚禁我们”，这不仅是古代犹太先知摩西（Moses）提出的愿景，也是赫尔德认为现代德国应实现的民主愿景。

大约30年后，施莱格尔在其第十次维也纳演讲中表达了他对当时匈牙利民族运动的热情关注，其中他赞美了16和17世纪匈牙利民族抵抗科菲努斯国王（King Matthias Corvinus）统治的斗争（Schlegel 237）。科菲努斯国王喜欢意大利和拉丁文化，就象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喜欢法国文化一样引人注目。同样，就象匈牙利民族运动为抵抗当时奥地利的霸权而借用科菲努斯国王时期的匈牙利民族传说一样，施莱格尔也

1 18世纪的德国贵族包括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 the Great, 1712-1786）在内都对法国的语言、文学和文化怀有特殊癖好，他们认为德国的东西太粗俗。

希望他的德国同胞们借用德国的文学与文化记忆来抵抗法国文化在欧洲的蔓延。他的第一个愿望就是促进正在形成中的德国文学来反对已经广为接受的法国文学，并将德国文学作为德意志民族在精神上形成的标志。他想建立德意志民族精神以将其同胞从法国文化霸权下拯救出来。但这意味着施莱格尔采用一个更为广义的文学观来作为德意志人民的身份识别手段，因为德意志民族在一些帝国的侵占下已被剥夺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这种文学观念上他接触到了卢梭和赫尔德，他们都相信“通过理解历史根源而提升的自我身份意识可引起自己认识上的变化”。

“首先，它可以在他者的时间、空间以及语境中促进本族人民的反思性自我认同和自我定位；其次，它可使本族人民认识到自己不只是历史的被动旁观者，他们也可将自己看作是历史的积极参与者”。（Barnard 161-162）

成为历史的积极参与者是那些民族摆脱被驱逐、被污辱和被贬低的痛苦经历的唯一途径。由于欧洲有许多相互联络的杰出知识分子，而且这些知识分子又反对认同中心权力，认为那是不可接受的监护，因而跨境联盟的解放潜力变得异常突出。如果人类社会是按照人们的设想建立起来的，那么他们唯一可行的选择将是那些相互合作的弱小群体整体实行自治。人类将是由内向外和由下向上地呈现自我，而不是《文字共和国》所提出的从上面强加这一所谓普遍模式。这种通过相互联络强调边缘文学和文化的方式明显是对城邦国家进行世界主义重新定位的一种新眼光。

通过反抗法国的文化霸权，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者的跨境联盟为大约半个世纪后在1848年的欧洲民族革命风暴中确立的中东欧“受压迫的民族主义论”（dominated nationalisms）竖立了标准（Balibar 62）。1848年爆发的那些革命展现出类似的相互联络倾向，即在国外寻求盟友来加强自己在国内反压迫斗争的力量。它们力求在异己的国内贵族统治下捍卫自己脆弱的本族自我身份，就象卢梭以民族差异为由反对其巴黎同胞所宣称的普世主义一样。在德国的浪漫主义者之后，中东欧的“受压迫的民族主义论”突出地将矛头指向启蒙运动所标称的人类共性观，因为它忽视了人类的语言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浪漫主义者看来，人性永远是与语言相关联的，而且由于民族语言的多样性，人性的构成也有差异性。对浪漫主义者来说，民族语言不仅是其使用者之间交流的外在工具，而且也是他们思考、感知、想象的内在结构。

三

总之，跨境联盟这一传统在欧洲现代化的历程中一直很引人注目。然而中东欧后帝国时代的受害者们极大地重构了这一技术。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络

采取了行动的形式，印度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其关于殖民环境的开创性分析中将这种形式称之为“破坏性的模仿”（subversive mimicry）（Bhabha 1994, 94-132）。通过复制殖民者的手法，被殖民者无意中在拙劣地套用着这些手法。根据巴巴的分析，被殖民者通过采用殖民者的成就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抹去他们与殖民者之间的差异，相反却只是强化这些差异（Bhabha 1994, 122）。的确，欧洲帝国的那些边缘省份已经通过采纳帝国所取得的成就破坏了现代化。然而帝国边缘的臣民们通过贬损西欧的成就不情愿地强调自己的落后与帝国中心间的关系，而实际上他们是努力想取得这些成就的。帝国边缘地区通过吸纳后重新表达的这种行为不自觉地强调了其边缘的模糊性。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其《论道德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中关于“仇富”的著名分析：

贵族品质产生于凯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隶品质从一开始就对“外界”、“他者”、“非我”说“不”。正是这个“不”字成为其创造性行为。以眼还眼是“仇富”的一个特征，而欣赏的目光本是指向外部的而不是内部自我的。为了生存，奴隶品质从一开始总是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从心理学上讲，它需要外部的刺激才能行动，其行动从根本上来说是反应。（Nietzsche 22）

例如，最初修筑铁路是为扩展帝国中心的经济，但后来逐渐变成了帝国边缘地区抵抗中心的工具（Schenk 2013）。边缘省份的精英们是在帝国建立的中央或地方学校中受的教育，却利用他们学得的知识来反抗帝国的中心（Barkey 110）。如果说帝国教育的目的是要使帝国的社会成份差异化，而这些边缘省份的精英们却利用教育使自己的“共同体”同质化。因此近代出现的“社会”（society）概念无意之中“为‘共同体’（community）概念的更精准扩散创造条件，因为‘共同体’现在成为所有不能归于‘社会’概念者的一个集体名词”（Rosa et al. 37-38）。然而，不仅仅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匈帝国政治上的系统差异化产生了民族主义这一不治之症，“这种民族主义形成于奥匈帝国体制的背景下并出现于该体制所提供的可能性中”（Judson 452）。奥斯曼帝国的商业化和货币化浪潮也导致后院起火，因为“旨在加强帝国统一和现代化的商业化与货币化改革最终却引起旨在分裂帝国的各种民族运动”（Keyder 32）。

上面所描述的通过吸纳帝国的成就而进行的“颠覆行动”（operation of subversion）在帝国的边缘已经成为现实，而在帝国崩溃后建立的民族国家中再次掀起新的浪潮。如果说在过去的帝国时代颠覆行动是由作为帝国中心之受害者的各民族精英们进行的，那么在后帝国时代新建立各民族

国家中颠覆行动则是由这些精英们的受害者进行的。其结果是，在后帝国时代的中东欧地区，即从前西欧国家试图通过建立民族国家将其同化到西欧的地区，那些“跨境牺牲共同体”（transborder sacrificial communities）崛起成为“国籍忽略区”（zones of national indifference）（Zahra 2010）。颠覆行动作为从帝国转化为民族国家的过路中不可转化的顽瘤，它们发展出了一种源自国内民间的“地方世界主义”（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Bhabha 1996），以对抗帝国中源自官方的“国际世界主义”（international cosmopolitanism，即独立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这些“身份不确定区域”（zones of indeterminacy）的逐渐扩散破坏了以民族为基础的社会整合平台。根据“身份不确定区域”这一术语的提出者伊丽莎白·波维内利（Elizabeth Povinelli）的解释，“身份不确定区域”充满被压制的可能性，即这些区域会将自己的潜能释放到所在的社会集合中去，因而导致社会的条块化和分裂断层（Povinelli 3-4; 11-13）。

通过将众多弱小群体的多样性融入到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中，跨境牺牲共同体创造出另一种互利主义模式。这使得因某种亲缘关系而对想象中的家乡所怀有的向往之情冲破了所处民族国家的法律。对政府领导的统一政策所进行的这些内部“零星抵抗”（pockets of resistance），被当代一系列杰出政治理论家解释为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同等的歧视”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在这些理论家看来，现代世界的生产引起了一个附效应，就是出现了被阻止进入既定人类空间的未来人、幽灵人和非人（Agamben 121; Esposito 209; Butler 92）。这些不合时宜者或被时代淘汰者们为将自己从其卑贱处境中解救出来，他们也找到另一种形式的同类归属感。

的确，政治地理被重构的中东欧成为其众多成员民族的可怕政治监狱，这导致其成员民族对新建立的民族国家的归属感被他们要求将这些新建立的国家从其宪法和官方记忆中抹除的愿望所代替。新的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s）降生并临时拼凑了这些成员民族，以强加的“他者”为名将各成员民族拴在统治民族的院墙之上，剥夺它们的选择，封杀它们的不同声音，灭除它们的复杂身份（Brubaker 20-21）。由于这些成员民族希望一种新的方式来共享所处的政治空间，因此它们与国外有同样不幸感受的被剥夺者们建立联盟的大门就大大敞开了（Fritzsche 2004）。然而，当这些成员民族跨越按民族、宗教、阶级、性别、文化或意识形态新标出的国界线去认同于国外有同样不幸感受的人并和他们联络时¹，“跨境共同体”的缔造者们将自己所在的国家逐步引向分裂或解体。为将有各种各样挫败感的人凝聚成可向他们许诺救药的平台，跨境共同体的缔造者们不惜鼓动最怪异的受害者为其行动计划服务

1 少数民族认同于其国外祖国的代表人物，宗教少数派也认同于他国同教派的代表人物，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则认同于外国的工人阶级，受压迫的妇女也认同于外国的妇女，受挫的法西斯也认同于外国的法西斯，先锋派艺术家亦认同于他国有同样主张的同类。

(Hanson xvi)。这样，在新建立的民族共同体中出现的最初具有解放性质的跨境共同体堕落成为民粹主义集团。

当跨境共同体的缔造者从“身份不确定区域”中建立新型的人类群体时，他们求助于过去对受害者所做的描绘，因为这些描绘具有美化异类迷者的潜能。在建立这种对过去的联系时，他们除超越国家、宗教、文化、语言、意识形态的界限外，也超越了历史时代，忽视共同体中极端不同的异类成员族群之间存在的一系列重要差异。他们不断地利用此类模糊的类似，例如他们甚至认同于一些伟大的宗教创始人，因为这些宗教创始人的殉难曾激起无数各类受害者们的挫败感（Mylonas 7-8）。通过将新的社会主义、法西斯、民族主义的因素融入到一些根深蒂固的宗教模式中（Berend 201），他们激励新国家的受害者们投身于对所谓长期折磨者的复仇行动之中，而那些折磨者们也同样不加分别地进行联合。因此那些被招募的受害者共同体则被直接投于复仇行动中。总之，如果说西欧的民族国家将通讯、交通和商业上的移动性用于促进其社会的个人差异，那么中东欧的民族国家则将这些移动性用于促进其共同体的集体同质化，这种同质化是以对他者不加区分地妖魔化并加以驱逐为基础的。他们混杂而激进的牺牲叙事不是独特地、微妙地、私下而秘密地进行，而是将施暴者和受害者以一种明确对立的两极化术语来加以描绘（Alexander 16-19）。

然而，仅在几十年后，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西欧殖民帝国纷纷瓦解时，反殖民运动表明这种畸形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中东欧，就象西欧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所宣称的那样。人们突然发现，所谓伟大的西欧民族的独特身份也同样建立在欧洲之外所形成的无数“身份不确定区域”的基础之上。这些“身份不确定区域”的迅猛扩散不仅在二战后慢慢渗透到以前的西欧帝国中心，也慢慢分解了西欧那些所谓的“导师”民族。当殖民主义的暴行如大屠杀等象回飞镖一样出现在欧洲心脏后，整个欧洲都进入了动乱的后帝国状态。欧洲内部的不平衡、不和、分裂等迫使欧洲面对其过去帝国时代所造成的后果。最近欧盟内部和外部出现的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及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证明其对抗远远没有结束，它还将以新的、扩大的、变换的形式继续下去。

这意味着欧洲必须面对其内部和外部的“身份不确定区域”，这些“身份不确定区域”是欧洲不可同化的组成部分。这些区域的不协调性并不表明它们是绝对的他者，相反却是一种带伤痕的近亲。这些“身份不确定区域”作为不可处理的残渣寓居在欧洲，污损其声誉，破坏其自足，挫败其开发人类财富的宏伟计划。欧洲的这些带伤痕的近亲及其“身份不确定区域”意味着一种艰难的共栖关系。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欧洲已经面对这个挑战，更谈不上接受这个挑战。

Works Cited

- Agamben, Giorgio.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8.
- Alexander, Jeffrey. *Trauma: A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and Malden: Polity, 2012.
- Appadurai, Arju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8.
- Balibar, Etienne. *Politics and the Other Scen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Barkey, Karen. "Thinking about Consequences of Empire." *After Empire: Multiethnic Societies and Nation-Building.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Russian, Ottoman, and Habsburg Empires*. Eds. Karen Barkey and Mark von Hagen. Boulder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6. 99–114.
- Barnard, Frederick M. *Herder, Nationality, Humanity, and History*. Montreal and London and Ithaca: McGill-Queen's UP, 2003.
- Berend, Ivan T. *Decades of Crisi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before World War I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 of California P, 1998.
- Berlant, Lauren. *Cruel Optim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P, 2011.
-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 "Unsatisfied: Notes on 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 *Text and Nation. Cross-Disciplinary Essays on Cultural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Eds. Laura García-Moreno and Peter C. Pfeiffer. Columbia, SC: Camden House, 1996. 191–207.
- Brubaker, Rogers.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al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6.
- Butler, Judith.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4.
- Cornwall, Mark. "The Habsburg Monarchy." *What is a Nation? Europe 1879–1914*. Eds. Timothy Baycroft and Mark Hewits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P, 2006. 171–192.
- Esposito, Roberto. "The Person and Human Life." *Theory after 'Theory'*. Ed. Jane Elliott and Derek Attri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205–220.
- Evans, R. J. W. *Austria, 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Essays on Central Europe c. 1683–1867*. Oxford: Oxford UP, 2006. 134–146.
- Fritzsche, Peter. *Stranded in the Present: Modern Time and the Melancholy of History*.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P, 2004.
- Hanson, Stephen E. *Post-Imperial Democracies: Ideology and Party Formation in Third Republic France, Weimar Germany, and Post-Soviet Russi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0.
-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Ed. Martin Bollacher. *Werke in zehn Bänden*. Ed. Martin Bollacher et al., Vol. 6. Frankfurt am Main: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89.

- Hobsbawm, Eric J. "The End of Empires." *After Empire: Multiethnic Societies and Nation-Building.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Russian, Ottoman, and Habsburg Empires*. Eds. Karen Barkey and Mark von Hagen. Boulder, CO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6. 12–16.
- Judson, Pieter. *The Habsburg Empire: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2016.
- Keyder, Caglar. "The Ottoman Empire." *After Empire: Multiethnic Societies and Nation-Building*. Eds. Karen Barkey and Mark von Hag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Russian, Ottoman, and Habsburg Empires*. Boulder, CO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6. 30–44.
- Kożuchowski, Adam. *The Afterlife of Austria-Hungary: The Image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in Interwar Europe*. Pittsburg: U of Pittsburg P, 2013.
- Mylonas, Christos. *Serbian Orthodox Fundamentals: The Quest for an Eternal Identity*.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P, 2003.
- Nietzsche, Friedrich.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A Polemic*. Trans. Douglas Smith.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P, 1996.
- Povinelli, Elizabeth. *Economies of Abandonment: Social Belonging and Endurance in Late Liberal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P, 2011.
- Rosa, Hartmut et al. *Theorien der Gemeinschaft zur Einführung*. Hamburg: Junius, 2010.
- Rousseau, Jean-Jacques. "Conside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de Pologne," in *Discour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Projet de constitution pour la Corse, Conside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de Pologne*. Ed. Barbara de Negroni. Paris: Seuil, 1990.
- Schenk, Frithjof Benjamin. "Travel, Railroads,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 the Russian Empire." *Shatterzone of Empires: Coexistence and Violence in the German, Habsburg, Russian and Ottoman Borderlands*. Eds. Bartov, Omer and Eric D. Weitz. Bloomington: Indiana UP, 2013. 136-151.
- Schlegel, Friedrich. *Geschichte der neuen und alten Literatur (1812), Kritische Ausgabe*. Ed. Ernst Behler, Vol. 6. Munich and Paderborn and Vienna: Schöningh, 1961.
- Wolff, Larry. *Inventing Eastern Europe: The Map of Civilization on the Mind of the Enlightenment*.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4.
- Zahra, Tara. "Imagined Noncommunities: National Indifference as a Category of Analysis." *Slavic Review* 69:1. (2010): 93-119.